

寻找理性经济行为的逻辑新起点^{*}

——试论中国传统伦理下的中庸理性经济人

何 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 要: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追求效用最大化是社会个体理性行为的基本准则。文章认为主流经济学理性假设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揭示特定人类社会的独特复杂特征。主流经济学家忽略了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实然”——中庸理性。文章尝试在以中庸理性为假设的理性经济人模型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伦理下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演化及其存在的可能空间。

关键词:效用最大化;理性经济人;中庸理性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11)05-0058-10

一、引 言

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一直是主流经济学赋予理性人假设的重要内涵,在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中,追求效用最大化是社会个体理性行为的基本准则。在由美国次级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的今天,遭受沉重经济打击的国家、组织和个人都不免陷入主流经济学所不能解释的困境中:作为危机的导火索,美国的房贷者和金融机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似乎是非常符合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当全球人类面对危机造成的经济环境恶化时,却无法在其中找到理性的踪影。这种理性吊诡的现实再现赋予学界对“理性”进行反思的责任,因为在个人选择方面,顺应自己欲望不一定是理性的(黄慧英,2005)。我们不禁要问:在效用最大化之外,其他的理性经济人是否存在?而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经济行为中的“理性”又是什么?当西方主流经济

收稿日期:2010-09-0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青年资助项目(GD10YGL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0CGL003)

作者简介:何 轩(1976—),男,上海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管理学博士。

学家总是以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为“实然”假设,抨击其他学者的“应然”批判时,其实他们忽略了在现实生活中西方文明之外的“实然”——中庸理性。

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个人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也应该有自己的逻辑起点,而且也应该以人为逻辑起点(俞品根,1998)。本文我们尝试用中庸理性替代西方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假设,在此基础上探讨发展经济学中国学派的可能道路。对中国人而言,中庸理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它是相对于西方工具理性的另一种理性思维模式,同时中庸理性也是儒家思想中理论性较强的概念,具有学术上的可操作性。如果说中国人能够超越西方的经济学或者说能够继承并超越它,一个可能的突破点是在经济学理论中融入我们的文化强势,也就是文化的比较优势,因为中国哲学深厚的人文基础和人文传统,把人的意义带回到经济学,这就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汪丁丁,1996)。

在此,我们不是批判主流经济学所坚持的理性基础假设“不现实”,因为没有理论可以精确地反映现实世界,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学科都不可避免地广泛应用一些未经验证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作为其最根本的、先验性的基础假设。所以我们的批判点应该是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缺乏特定的理论和概念内容,没有向我们揭示特定人类社会的独特复杂特征(霍奇逊,2008)。

二、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

主流经济学所指的理性就是自利的人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且学者们认同其中最关键的涵义是“最大化原则”。田国强(2005)就认为,在经济学中,比利己更强的行为假设是理性假设,也就是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最大利益。而汪丁丁和叶航(2004)更是直接指出,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范式按其内在逻辑来说就等价于“最大化原则”,所谓理性就是指行为主体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经济人的称呼通常加之于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卷2,2000),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是将工具理性作为假设基础的。

所有涉及手段与目标之间关系的理性都是工具理性(张德胜等,2001),韦伯所指的工具理性也是选择有效的手段达到既定目标(Habermas,1984)。工具理性具有计算性、功利性和推论性。较为通俗的理解是,持工具理性的人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亦即所选的手段是否是最有效率、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其他的并不顾忌。更确切地说,工具理性是不管目标是什么,只要目标既定,就要提供(找到)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张德胜、金耀基,1999)。

但是,主流经济学的这种“理性”及其内核“最大化原则”在“博弈”行为中

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来自逻辑与实证两方面的挑战。如果坚持个体(工具)理性的“最大化原则”,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帕累托无效”的结果。如果坚持获得“帕累托最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博弈决策中放弃“最大化原则”的初衷(汪丁丁、叶航,2004)。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仍然认为,尽管这种理性假设不完全真实,但与现实基本接近,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田国强,2005)。其实追根溯源,最大化原则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做的贡献,也是奥地利学派发起的“边际革命”的结果,它承接边沁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痛苦”最小化导致形式逻辑上的“极大化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为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但是,我们无法忽视麦金太尔的批判:任何理性都是在具体思维传统之内的理性。处于不同传统的个体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在许多方面是冲突的,是被处于其他理性传统中的个体认为是“非理性”的(汪丁丁,1998)。

因循以上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总结,主流经济学目前理性假设的形成第一是因为起始于功利主义哲学根源,第二是因为边际革命使其变得具有可论证性和可操作性。如果是这样,对其批判首要的是找出一个根本的、先验性的、基于其他哲学根源的理性假设,因为虽然批评者指出了主流经济学传统理性经济人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却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像传统假设一样简单和可用,并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假设结构用以替代传统理性经济人假设(庄宗明、杨旭东,2001)。

三、中庸理性的存在

《尚书》以“中”表示合宜,而首先将中庸二字并用的是孔子(《论语·雍也》),孔子所说的中庸是指过犹不及、恰到好处的状态或达到此种状态的行动取向。个体在中庸这种实践思维的指导下,在思考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时,其特点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细察社会人际情境中各种人际关系的动力和影响这些人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并且,特别关心这些动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庸的关键行事特点主要是:(1)注重自我约束,不随一己情绪而采取实时行动;(2)细察自己行动可能涉及的所有其他人,以及自己行动可能给这些人带来的后果(亦即对其他人及整个局面的影响);(3)根据具体情境选定“恰如其分”的方案;(4)通过“自我反省”、“观察形势”等反馈机制,修正自己的方案。如此循环渐进,以求达到最佳效果(杨中芳,2001;何轩,2009)。中庸与所谓的“折中”是完全相反的,中庸的思想是游刃于两极之间,不固守任何观念,不僵化。因此人们的行为可以完全相反,两种行为都是有道理的(弗朗索瓦·于连,2004),这是一种完全相反但又合理并存的思想。

到底怎样的人才算是理性经济人,其实这涉及的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时,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的经济学家(至少是理论经济学家)不得不再次追问黑格尔和韦伯反复追问的古典问题:什么是理性(张德胜等,2001)?其实,不同的价值体系有不同的理性,儒家中庸之道也是一种理性,它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有共通之处,却不完全相同。它的特色是以整体观的视野、自我节制的心态求取恰如其分的最佳状态。这种行为取向,正好替哈贝马斯所企求的理性沟通提供了心理的意向和准备。

中庸具有实践意义,虽具备工具特性,但不能与工具理性混为一谈,因为它不是从行动者的角度求取效用最大化。从争取效益这方面来说,工具理性是个“无限模态”,认为可以做得到的便尽量去做;同时工具理性具有单向性(只讲实效不顾其他)和独白性(忽视协调合作,只关注运用现有资源、手段和程序,最大限度地去完成目标)。而中庸理性则属“节制模态”,不只想到自己,还要顾及他人,有体谅和考虑周全之意。中庸理性并不否认人的自利性,而是强调个体在自利的同时要考虑他人的利益,因为中国人更在意个体和外界的“和”(张德胜,2008)。中国人的世界观认为,个人的利益、情感和意向的最大化不是个人选择行动的最高价值标准,整体的动态均衡才是最重要的,个人只是这个动态均衡的一员。中国人认为“合理”这个概念很重要,这里的合理隐含一种实用取向,即从整体角度在不同的有效准则之间寻找平衡点。在西方关于“理性”的定义中,一般所理解的理性与合理性确实是有区别的。但是把抽象层次提高之后,则合理是理,理性也是理。这样,理性指合理状态及相关能力,是经得起批评的,所以哈贝马斯说:“理性是面对批评时维护某种表达的能力,而表达可以是一种陈述,也可以是目标取向行动。”^①此外,除了“最佳状态”,还有几个与理性经常相联并用的词。譬如布莱克伯恩编写的《牛津哲学字典》中“理性”一条就说:“认为某事物是理性的,等于认为它是可理解的、适当的、或者是必须的,又或者是与一些公认的目标吻合的,例如追寻真理或止于至善”。^②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中庸定义为一种中国文化传统价值观下可与西方理性系统对话的“理性”,是可以接受的。正因如此,之前就有中国学者曾经提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中庸”和“和气生财”等思想,构建中国的“合作”经济学的有益设想(黄少安,2000)。

在实现成功和个人修炼的过程中,中国人常常会(在保证自己的基本利益后)做出有意让出本可以获得且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的行为。请注意,这与有限理性所指的限于个人能力及搜寻时间等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达到最优目标的行为不同。何大安(2009)在西蒙有限理性的基础上提出,应该用行为最大化替代效用最大化。与何大安一样,我们也认同其引用的美国经济协会会长阿克洛夫文章中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将行为准则放置于效用函数之中,大大损害了人们对真实经济世界的理解”。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提出的中

庸理性经济人是在能力和外部环境都能够让其获取最大化的情况下,有意放弃这种最大化,而追求一种适度。也可以这样解析,西蒙和何大安等提出的是被迫的“满意”,而中庸理性经济人是主动的“满意”。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别的生命,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不完全由自然确定,不完全被他的生存本能所决定,也不完全被自然法则所左右(郑臣,2007)。在中庸理性思维下,行动者是有意放弃已经获得(或完全有能力获得)的利益。他们会根据整体情况选择一个“恰如其分”的方案——效用合理化,从而使自身与所处的系统最终达到一种动态的长期和谐状态,正如中国人所讲求的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钱穆(2001)认为中国有必要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坚守自古有之的“人文本位”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保持社会的均衡与良性,而不能像西方一样走向“超出必须之经济”。在一个国家已经高度现代化或面临现代化危机时,我们有必要对儒家追求和谐秩序的理性进行重新评估。正如梁漱溟在其乡村建设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理想主义有两种:一种是理智主义,即客观分析的理性;另一种是中国式的“理性”主义,主张“平静通晓而有情”,“有情”指的是情理,有人情、有温情(顾红亮,2008)。亦即,中国人有属于自己的、与西方理性不一样的理性可以作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基础价值观。

四、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演化均衡分析

总体来看,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类似物理学对于真空状态的假定,它的操作性强,排除不确定因素,特别有利于建立模型进行数理分析,这是它的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因为这种偏重操作性的假设将社会过于简化,将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社会变成一副骷髅。为了保持理论的一般性,目前的主流经济学似乎牺牲了太多。在本研究中,我们没有停留在李培林(2001)指出的“证伪”性阶段,而是努力迈出了探索性的一小步。我们在叶航、汪丁丁和罗卫东(2005)模型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演化及其存在的可能空间。中庸理性在经济行为中的关键体现是:个体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顾及他人利益,注重自我约束,根据具体情境谋求一个“恰如其分”的方案,这其实与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情况非常相似。

与叶航等人一样,我们认为,一个中庸理性经济人(即追求效用合理化经济人)的生存适应性不仅取决于他与那些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交往,也取决于他与其他中庸理性经济人的交往。相比之下,后者更容易达成合作而使双方享受合作剩余,只要合作剩余足够大,就能弥补中庸理性经济人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交往的损失。同样,一个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生存适应性也不仅取决于他与中庸理性经济人的个别交往,还取决于他与其他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交往。由于这些交往很难达成合作,从而使双方无法享受合作剩余。如果这种损失足够大,就会使中庸理性经济人攫取的进化优势损失殆尽。

但是在我们的模型中,中庸理性经济人在博弈中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进行合作时,虽然效用最大化者可以从中庸理性经济人身上获取很大的利益,但中庸理性者并不像完全利他者那样行动,而是会权衡当下的情况,为自己保有一部分最基本的利益。因此,二者的收益分配不是叶氏模型中的一方完全获利而另一方完全损失,我们假设为(1,9),而不是叶氏模型中的(0,10)。其他的支付函数与叶氏模型是一致的:中庸理性经济人相互合作时仍然会均分双方收益,为(5,5);而两个效用最大化经济人合作时,结果是(-2,-2)。

表 1a 中庸理性者与效用最大化者的收益矩阵

	中庸理性者	效用最大化者
中庸理性者	5,5	1,9
效用最大化者	9,1	-2,-2

表 1b 叶航等(2005)利他者与利己者的收益矩阵

	利他者	利己者
利他者	5,5	0,10
利己者	10,0	-2,-2

下面我们以 X 代表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数量,Y 代表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数量来分析中庸理性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生存情况。把表 1a 中假定的损益当作生物个体不同境况下的生存适应性,则效用最大化者的期望适应性 $EU_x = -2X + 9Y$,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期望适应性为 $EU_y = X + 5Y$ 。令二者相等,则当中庸理性经济人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之比 Y/X 为 $1/2$ 时,每个个体的生存适应性都是一样的;如果二者之比小于 $1/2$,中庸理性经济人适应性大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则中庸理性者数量趋于增加;反之,如果二者之比大于 $1/2$,效用最大化经济人适应性大于中庸理性经济人,则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数量趋于增加。因此,演化均衡将使中庸者与效用最大化者比例收敛于 $1/2$,即在上述条件下,群体中各有 50% 的人表现出中庸或效用最大化的倾向。这两种行为都是“进化稳定策略”(ESS)。对比叶氏模型,其演化均衡比例为 $2/5$ 。我们的发现是,较之于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中庸理性经济人的生存空间得以扩大(从 40% 上升到 50%)。该演化均衡如图 1 所示。

从更一般的情形考虑,在叶氏模型的两个变量 V(代表利他合作的全部收益,本模型中代表中庸理性经济人合作的全部收益)和 C(代表合作剩余)的基础上,引入中庸理性经济人为自身保留的最基本收益 B ($0 \leq B \leq V/2$)。其中, $V/2$ 表示两个中庸理性经济人合作的平均收益, $(B, V-B)$ 或 $(V-B, B)$ 表示中庸理性经济人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合作的收益,而 $(V-C)/2$ 则代表丧失合作剩余情况下,每个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平均收益,该收益矩阵可表示为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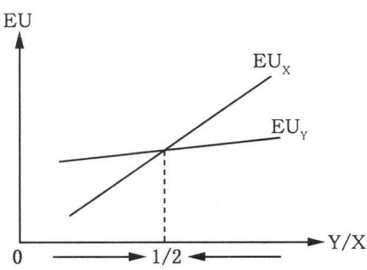


图 1 中庸理性经济人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演化均衡

表2 中庸理性经济人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一般性收益矩阵

	中庸理性者	效用最大化者
中庸理性者	$V/2, V/2$	$B, V-B$
效用最大化者	$V-B, B$	$(V-C)/2, (V-C)/2$

下面仍然以 X 代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数量, Y 代表追求效用合理化的中庸理性经济人数量, 则两类人的期望适应性分别为:

$$EU_X = \frac{V-C}{2}X + (V-B)Y \quad (1)$$

$$EU_Y = \frac{V}{2}Y + BX \quad (2)$$

演化均衡 θ^* 为两类经济人的预期适应性相等点:

$$\theta^* = EU_X = EU_Y \quad (3)$$

将(1)式和(2)式代入(3)式可得:

$$\theta^* = \frac{C}{V-2B} - 1 \quad (4)$$

叶氏模型得出的演化均衡点为 $\theta_1^* = (C-V)V$, 通过简单计算即可得:

$$\theta^* - \theta_1^* = \frac{C}{V-2B} - 1 - \frac{C-V}{V} = \frac{C}{V-2B} - \frac{C}{V} \geq 0 \quad (5)$$

由上可知, 中庸理性经济人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演化均衡较之于利他者与利己者之间的效益均衡得到了改善。我们将上述演化均衡表示如图2, 从图2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横轴为两类人比例 Y/X 、纵轴为期望生存适应性 EU 的坐标中, 实线部分分别代表我们模型中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期望适应性 EU_Y 和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期望适应性 EU_X , 虚线部分则代表叶氏模型中利他者的期望适应性 EU_{X1} 和利己者的期望适应性 EU_{Y1} 。

图2表明, 在 θ_0 (代表在任何—个群体中, 由突变、迁徙或其他原因产生的中庸理性经济人必须超越一个阈值才能得到进化) 和 θ^* 之间, 即 $\theta_0 < Y/X < \theta^*$ 时, 中庸理性经济人的生存适应性大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适应性, 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数量趋于增加。而 $Y/X > \theta^*$ 时, 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生存适应性大于中庸理性经济人适应性, 追求效用最大化者的数量趋于增加, 二者比例收敛于 θ^* 。

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追求效用合理化的中庸理性经济人和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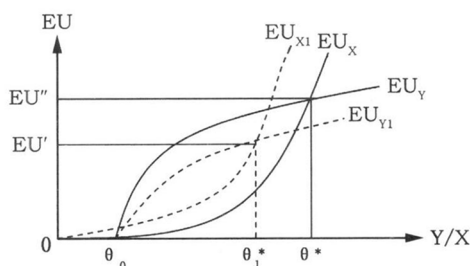


图2 中庸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演化均衡与叶氏模型(2005)的比较

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行为一样,也是一种“进化稳定策略”(ESS)。但是,较之叶航等(2005)对利他者—利己者的分析,中庸理性经济人的生存适应性空间扩大了($\theta^* > \theta_1^*$),如图2所示,演化均衡点 θ^* 位于 θ_1^* 的右侧。同时,将我们模型中的 EU_X 和 EU_Y 与叶航等(2005)利他者—利己者的 EU_{X1} 和 EU_{Y1} 进行比较可知, $EU_Y > EU_{Y1}$ ($EU_Y = \frac{V}{2}Y + BX > \frac{V}{2}Y = EU_{Y1}$), 而 $EU_X < EU_{X1}$ ($EU_X = \frac{V-C}{2}X + (V-B)Y < \frac{V-C}{2}X + VY = EU_{X1}$)。这说明当中庸理性经济人与效用最大化经济人同时存在时,中庸理性经济人的效用曲线在利他者效用曲线之上,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的效用曲线在利己者效用曲线之下,因此, EU_X 与 EU_Y 曲线相交时(即演化均衡点)的期望适应性点 EU'' 要大于叶氏模型中利他者—利己者的期望适应性均衡点 EU'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模型中,当自然选择的个体是追求合理化效用的中庸理性经济人时,其将比利他者具有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利的进化优势。

五、结 论

中国人常说,“见利思义,义以生利”,其实这些俗语已经深含我们希望通过模型阐述的所有内涵。如前所述,具有中庸思维的个体会细察自己行动可能涉及的所有其他人,以及自己行动可能给这些人带来的后果。他们会根据整体情况而选择一个“恰如其分”的方案,从而使自身与所处的整体系统最终达到一个动态和谐状态。这种“恰如其分”的行动方式正体现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当偏离了这种“恰如其分”的考量,即当系统中某些个体缺乏全局观而采取某些不当行为时,就会造成系统整体的灾难,出现“理性的吊诡”,或者说是理性的自我否定(张德胜等,2001)。当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总是以自己的最大效用理性经济人是“实然”假设来抨击其他学者的“应然”批判时,被他们所忽略的、现实生活中存在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实然”——中庸理性也是合理且具有对经济行为的解释力的。

如果经济学家离开人的存在和立场分析经济问题肯定是极其片面的。我们不能孤立地考察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生物适应性是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它不可能被某个单一事件或者关系所决定。在重温斯密的思想体系和经济学后我们发现,“经济人”的活动必须是“经济与道德”的统一,任何社会商品生产者的经济行为都必须有其内在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在经济学研究的高层次上,应该存在一个对人的研究领域。在这个更高层次上,几乎每个问题都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相结合的问题(许崇正,2005)。中庸理性作为儒家思想中理论性较强的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又是如此根深蒂固、潜移默化,无疑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目前工作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其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儒家伦理富含自由经济思想,中庸理性并不排斥追求利益,只是要求个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应该通过自身道德的修炼杜绝谋求不义之利。罗卫东(2001)曾经精辟地指出,所谓的经济学不谈道德,其实是要求经济学不要谈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不做非功利主义的评价。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济学以不做道德的所谓严格的“实证性”来证明它的科学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基于“实证”分析的科学性将会使经济学远离科学而且更加不得人心。超越道德的经济学,严格地说不再是经济学,而是应用数学。

* 本文还得到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0ZGXM63002)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省级重点文科基地)一般项目课题的资助。作者感谢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陈文婷博士在模型建立方面提供的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 ① Habermas, Jürge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eacon Press, 1984: 15.
- ② Blackburn, Simo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19.

参考文献:

- [1] 顾红亮. 儒家生活世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67—171.
- [2] 何大安. 交易过程中的行为最大化——对行为理性特征一种新的理论解说[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5): 116—127.
- [3] 何轩. 互动公平真的就能治疗“沉默”病吗? ——以中庸思维作为调节变量的本土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9, (4): 128—134.
- [4] 李培林. 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J]. 社会学研究, 2001, (6): 43—55.
- [5] 罗卫东. 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J]. 浙江学刊, 2001, (5): 39—43.
- [6] 马克思·韦伯. 儒教与道教[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第4章、第8章.
- [7] 黄慧英. 儒家伦理: 体与用[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163.
- [8] 黄少安. 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与“合作”经济学构想——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思考[J]. 经济研究, 2000, (5): 60—67.
- [9] 霍奇逊. 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 社会学科的历史特性问题[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75, 279.
- [10] 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 [11] 田国强.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 经济研究, 2005, (2): 113—125.
- [12] 汪丁丁. 道德基础与经济学的现代化[J]. 战略与管理, 1996, (6): 37—43.
- [13] 汪丁丁. 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J]. 社会学研究, 1998, (2): 1—11.
- [14] 汪丁丁, 叶航. 理性的危机——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 (1): 64—70.
- [15] 约翰·伊特韦尔, 默里·米尔盖特, 彼得·纽曼.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卷2)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57—58.
- [16] 许崇正. 重温亚当·斯密: 对中国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思考[J]. 学术月刊, 2005, (8):

19—26.

- [17]杨中芳.中庸实践思维研究——迈向构建一套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A].王登峰,侯玉波.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论丛(一)[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8.
- [18]叶航,汪丁丁,罗卫东.作为内生偏好的利他行为及其经济学意义[J].经济研究,2005,(8):84—94.
- [19]弗朗索瓦·于连.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9.
- [20]俞品根.西方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研究,1998,(11):74—80.
- [21]张德胜,金耀基.儒商研究:儒家伦理与现实社会探微[J].社会学研究,1999,(3):37—47.
- [22]张德胜,金耀基,陈海文,等.论中庸理性: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沟通理性之外[J].社会学研究,2001,(2):33—48.
- [23]张德胜.儒家思想与工具理性:中庸之道的社会学分析[A].陈来,甘阳.孔子与当代中国[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69—70.
- [24]郑臣.内圣外王之道:实践哲学视域内的二程[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165.
- [25]郑也夫.新古典经济学“理性”概念之批判[J].社会学研究,2000,(4):7—15.

Seeking for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Rational Economic Behavior: Research on Zhongyong Rational Economic Ma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HE X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view, the pursuit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is a basic criterion of social individual rational behavior.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fundamental drawback of the rational assumptions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is the lack of a revelation of unique complex features of specific human society. Mainstream economists always lose sight of practice which exists beyo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real life, that is to say Zhongyong rationa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introduce Zhongyong rationality into a rational economic man model, and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Zhongyong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its existing spac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ethics.

Key words: utility maximization; rational economic man; Zhongyong rationality

(责任编辑 金 澜)